

美國與古巴突然宣佈兩國啓動關係正常化，世界爲之一振。

國際輿論普遍稱讚這一舉措,同時也充分意識到其歷史意義。歐盟外交事務官員將之形容爲繼柏林牆倒塌之後“又一堵牆開始倒塌”。高牆相繼倒塌，是個很形象的描述。這個世界的確有過很多隔離牆,它們是人類 20 世紀意識形態“軟戰”的遺迹。國家與國家雖然山水相連,近在咫尺,卻被這些高牆所阻擋,不能互聯互通,進行正常的經貿和人員往來。

美國對古巴的封鎖是歷時最久的隔離牆之一。

美國對古巴實行政治孤立、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政策，自 1959 年菲德爾·卡斯特羅執政開始一直持續至今，也是當代歷時最久的隔離牆之一。

但爲什么又一個接一個倒塌了呢?歸根結底，是因為這些牆所使用的建築材料無非是些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觀念，是一種隨時都會在人們的思想發生改變之後發生風化分解的東西。

曾幾何時,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大近現代“元叙事”都曾大力生產意識形態建築材料,通過砌壘高牆,開展“牆戰”。

高牆所立之處，是一面面迎風呼嘯的觀念大旗。最艷麗刺目的大旗,曰民主,曰自由,曰人權,曰法治,曰平等,曰公正,它們豎立在國家的邊界上，將那些“不民主”、“不自由”、“沒人權”、“沒法治”、“不平等”、“不公正”的國家隔離起來。

在意識形態“牆戰”的高峰時期,戰事如火如荼。有柏林牆、“三八線”等防禦性的牆,也有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貿易禁運這種進攻性

美古關係正常化,哪些中國人應醒來

的牆。最戲劇性的一戰，是原本在社會主義國家上空高高飄颺的道義大旗“民主”,被西方國家通過精心謀劃的理論和實踐操作，如探囊取物般奪到了自己手里。

對於這場重大的戰略失利，人民大學楊光濱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著《讓民主歸位》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面對來勢兇猛的社會主義運動即大衆權利政治,在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中,西方思想界必須轉型，轉而論證自己的制度爲什么就是民主的。

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出現了——熊彼得。在熊彼得那里,流行幾千年的‘人民主權’即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理論被改造爲‘競爭性選舉’；民主就是選民選舉政治家來做決定的過程,而政治家如何做決定，議會如何立法,均不是民主政治的範疇。這樣,熊彼得來了一個簡單的顛倒:傳統的人民主權理論把人民當家作主當作第一位的,而在他那里,選舉過程是第一位的,人民當家作主是第二位的。經過西方社會科學幾代人的努力,‘熊彼得式民主’在薩托利的《民主新論》那里得到最完整系統的闡述和肯定，並把‘競爭性選舉’作爲類的二分對立,作爲劃分有無民主的根本標準,有則是自由民主,無則是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

而圍繞“自由”大旗的攻防戰,也是差不多的情況。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是通過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起來的，所爭取到的不是別的,正是擺脫了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統治這一寶貴的

“國家自由”。這就意味着，二戰後獨立的各個“民主主義共和國”,既是民主的,也是自由的,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原本佔有着極大的道義優勢。

但和“民主”大旗的丟失一樣,“自由”大旗也被西方奪到了自己手中。英美社會科學家們通過淡化國家這一主體，一味突出公民和個人，將“自由”的定義收窄爲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甚至不顧經濟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基礎這一基本常識,將“自由”完全等同于政治議題上的言論自由,然後與“競爭性選舉”對接,成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浴血奮戰換來了“人民民主”,卻被西方拿走了“民主”標誌,前赴後繼爭來了“國家自由”，卻被西方更換了“自由”定義;失去了所有道義大旗的社會主義陣營，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基本上就是任人宰割了。明明是名副其實的“民主主義共和國”,卻統統被戴上了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的黑帽子。

這就是包括古巴在內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困境，也是西方之所以能夠在意識形態“牆戰”中爲所欲爲、動輒以道義的名義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起封鎖制裁的根本原因。

不難想象,如果不是這樣,如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民主”還保持着大衆權利政治的本意,“自由”還保持着大衆經濟自由和國家自由的本意，各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共和國在道義上處於優勢，西方各資本家國家處於劣勢，那么,整個世界政治形勢將與現在大不相同。

對於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如果民主和自

由的大旗始終在自己手里,也就不至於靠閉關鎖國等極端措施抵禦西方的進攻,不會時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少了國內的“親西方派”和“帶路黨”，自身的政治改革、法制建設和社會發展也都會從容和順利許多。

從歷史邏輯上看，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集權和威權，恰恰不是政治改革裹足不前的原因,而是意識形態軟戰接連失利的結果。

但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時間最終會起作用。以中國爲主力軍,在充分享有了國家自由和大衆權利之後,通過改革開放,人民共和國在改善民生、擴大經濟自由方面實現了高速發展,反倒越來越突顯出政治保持威權、經濟持續開放、民生優先發展這個社會主義體制的特殊優勢。

與之恰成對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任由資本高於權力、寡頭強于政府、私權大於公權的體制弊病開始暴露無遺。雖然在意識形態軟戰中還繼續佔據着表面上的優勢，但其進攻性的力量已越來越衰弱;近年來發動的各場“顏色革命”,已淪爲地緣政治的策略性工具,全無真實道義可言了。

這就是美國放棄封鎖古巴的既定政策、啓動兩國關係正常化這一轉變的大背景。世界大勢,昭然若揭,想靠假的民主自由打垮人民共和國、維持西方資本集團的全球統治,這種企圖不僅不能得逞,最終一定還會自傷。

高牆轟然倒塌，幾家歡樂幾家愁，“異議人士”們茫然若失——說好的“人權高於主權”呢?隨着“牆戰”走入歷史,假的軟戰走入歷史,食古不化的政治殭屍們也將走入歷史。

文揚 2014-12-21

原衛生部部長高強談中國醫改

這個正確的健康理念落實到工作中還有非常長的工作要做。

我們現在衛生控制體系預防控制和疾病治療是分離的，我們的疾病控制人員大多是應付傳染病的傳播,而對慢性病、常見病的傳播是否沒有太多有效的手段。我們的醫生大多數是坐診看病,等病人上門,很少深入到社區、家庭去調查、瞭解疾病的流行趨勢。這方面我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何實現防治結合，不僅需要衛生系統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社會的學術機構、廣大媒體以及億萬民衆的積極參與，形成一種社會合力，共同控制疾病的發生和流行。

4、吐槽醫保報銷:越是進口的療效好藥,越不報銷

我們的醫保機構對於醫療服務行爲的監督非常薄弱，還對居民的健康權益卻設置了種種的限制，比方說我們都是參加醫保的，大家在看病報銷醫藥費的時候都有一個目錄，這個目錄內的是可以報銷一部分的，但是還有相當多的藥品和服務是在目錄外的,是全部不報銷的。越是貴重的藥、越是進口的藥物、越是一些療效好的藥,都不報銷。

現在問題在于，我們的醫保部門只監管報銷的費用,對群眾自費的費用沒有人管。如果我們的公立醫院爲了創收，就引導老百姓多服用自費的藥品和服務,群眾的負擔怎么會減輕呢?

我不贊成我們的費用報銷體系是採取一部分報銷、一部分不報銷的雙軌制,凡是與治病救人有關的費用和服務都應該納入到報銷的範圍。

5、吐槽藥物審批:幾個人關着門批藥,能不腐敗嘛!

現在的醫藥秩序非常混亂，不僅是大家都爲了經濟利益,都爲了利潤而爭奪市場,更嚴重的是過去幾年我們政府的部門在藥品的審批和藥價的核定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我們全國也就七八千種藥，但是批出來的藥號大概 18 萬、19 萬差不多，一個品種的藥有幾十個號,而且批出的價格不一樣,同樣的藥品相差十幾倍,這就導致了同藥多名、同藥多價，難免不產生腐敗。

藥品是一個特殊商品,不同于其他的商品。第一、事關人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人命關天;第二、患者使用藥品是在醫生指導下的被動消費,難以主動選擇;第三、藥價的高低和療效並非成正比，花錢多未必療效好。和別的消費不一樣,到飯店吃飯,花一千塊肯定吃的比花一百塊的好，但是吃藥花的錢很多，但是療效不一定好。所以這種特殊性就需要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對群眾的合理用藥給予高度的保護，就需要我們的政府對藥品實行特殊的政策和監管措施，而不是放任。

監管要價審批中出現了一些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出在審批制度本身，而是出在審批環節的不公開、不透明,只有少數人秘密審批,這不是制度問題,這是操作的問題。

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藥品基本都是政府監管,沒有放開。前幾天一個法國朋友來跟我介

12 月 26 日，由健康時報社、清華大學健康傳播研究所主辦的第七屆健康中國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是“醫藥健康產業：融合與新生”。在論壇上,原衛生部部長高強忍不住吐槽,很多吐槽點讓人感到意外。

1、吐槽醫療投入:國家投那么多錢,怎么老百姓就沒感覺

不久前媒體發表一個醫改藍皮書叫《中國醫藥體制改革報告》,它指出，2009 年—2013 年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累計是 30682 億，2014 年財政的預算安排的衛生支出 10071 億。2003 年我剛到衛生部的時候，全國的財政衛生經費只有 778 億,11 年增長到 10000 多億。

但是給人感覺是，政府的投入並沒有有效的減輕居民個人的負擔。政府的投入錢哪兒去的?有人說是被浪費了,流到了醫院、藥房、製藥企業和醫生的手里,人民群眾並沒有直接的受益。

問題在于政府的投入中，很少用于改革公立醫院不合理的創收機制。近幾年雖然有的醫院改革以藥補醫的機制,醫院收入減少了,但這部分需要彌補的,政府也沒有相應的增加補助，而是通過調整醫藥服務收費標準增加收入而彌補，這種機制怎么能夠有效的減輕群眾的醫藥費用負擔呢?

可以想像，在公立醫院仍然實行自收自支的創收機制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撥款只用于改善醫院的基礎設施條件和購買大型設備，其結果只能是進一步增強醫院的創收能力和水平，很可能進一步加重群眾的醫藥費用負擔。

2、吐槽醫院創收:只給你買設備,不給你發工資

對於醫務人員和群眾的利益融合我們講了多少年，一直強調公立醫院要保持公益性,不要和群眾爭利,但是收效甚微,關鍵就在于我們的醫院到現在還是一種公里創收的機制。政府對醫務人員的工資基本上是一分錢沒有的,完全靠醫療服務賣藥去掙錢的方式，掙得多發的多，掙得少發的少,這種機制是鼓勵醫務人員去增加收入的，同時也導致了醫療費用負擔的加重,這種機制始終難以解決。

我們有些部門堅持的原則是辦事不養人，我可以給你錢買設備、建房子,但是我們不能保證你工資,你去服務創收發工資,這種機制是把我們的醫務人員推到了群眾利益的對立面,這是導致醫患衝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既傷害了群眾利益，也傷害了我們醫務人員尊嚴和白衣戰士的形象。

3、吐槽慢病防控:病人越來越多,只會等病人上門

2003 年非典使我們認識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於是國家投入巨額的資金加強了基本預防控制體系建設，所以現在應對各種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生的能力明顯的增強，但我們在預防各種常見病、多發病、老年病、慢性病等方面，能力依然相當的薄弱。

心腦血管病、癌症、糖尿病、腎病、肝病等嚴重疾病仍然在威脅着人民的健康。2006 年我在衛生部有一個調查，當年全國到各類醫療機構去就診的人數是 28 億人次，去年超過了 60 億人次，這說明我們一些嚴重疾病的控制還存在着不少的問題。過去叫“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說明預防疾病控制的重要性,但是真正把

規劃有效的、有步驟的去實施發展問題。

現在各地發展健康產業有一個很明顯的動向,就是房地產企業的積

極性非常高，我們千萬不要把我們健康的一些設施變成房地產的問題。

醫療服務的保障是質量，而質量的保證是人才。可以投資蓋很多醫院、建很多病房,問題是我們的人才從哪里來。有人說可以從公立醫院去招聘人才,這個話不錯,問題在于,如果我們從全國的角度整體考慮，利用社會資本短期內可以蓋很多大型的醫院或者醫療城，但是培養不出相應的合格的優質的醫療人才，包括我們現在的一些公立醫院,靠貸款盲目的擴建、改建也出現了一些優質人才不足的問題，這種情況引起我們高度的警惕。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



唐永昶律师

电话: 216-534-1317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jxu@bmdllc.com